

隋 唐 考 古

考古短训班试用讲义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2级工农兵学员编
湖北省纪南城文物考古训练班印

一九七五年五月

054

71

目 录

一	序论	(1)
二	隋大兴城的创建和布局	(3)
三	隋代墓葬	(6)
	小型墓葬	(6)
	中原地区隋墓的等级	(7)
	南方墓葬	(10)
四	隋代陶瓷工艺	(12)
	中原地区陶瓷工艺和瓷窑遗址	(12)
	南方陶瓷工艺和瓷窑遗址	(13)
五	唐代墓葬	(15)
	墓葬形制	(15)
	陶瓷器	(18)
	陶俑	(22)
六	唐代前期的遗址和遗物	(24)
	长安、洛阳城的变化与殿堂设计的新特点	(24)
	含嘉仓遗址及其它	(29)
七	唐代后期的遗址和遗物	(32)
	宫殿遗址和窖藏	(32)
	反映强制推行儒家思想的遗物	(34)
八	隋唐时期边境地区考古简述	(36)
	云南地区的南诏遗迹	(36)
	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渤海遗迹	(38)
	新疆地区的城址和墓葬	(44)
九	隋唐时期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发现	(51)
	隋唐和中亚西亚文化交流的遗物	(51)
	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遗迹	(52)

一 序 论

隋唐从公元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建立隋朝起，直到公元907年唐亡，共经历了三百二十多年（其中隋朝不到四十年），在这漫长的三个多世纪中，我国处于大一统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比秦汉更繁荣强大的封建时期。

经过南北朝以来农民长期的斗争和一系列农民起义的打击，鲜卑贵族和汉族大族豪强地主的力量被大大的削弱了，南朝士族已经衰朽，山东士族也丧失了他们割据一方的政治经济势力。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南北朝后期各王朝都有庶族地主参加政权，扩大了政权的基础。隋王朝建立后适应政治、经济上的这种变化和全国统一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扩大了政府权力的范围。但是到了隋朝末年，隋炀帝的政权是士族豪强地主所控制的政权，杨广是士族豪强地主的总头子，他们推行的是维护士族豪强地主利益的尊儒反法的路线，统治阶级的暴政，使社会经济遭到惨重的破坏，把农民推到了苦难的深渊，全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隋末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士族豪强势力，改变了地主阶级两大阶层力量对比，促进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因而使儒家两条路线斗争也激烈起来。唐朝前期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推行了一条扶植和发展庶族地主，限制和打击士族豪强地主的法家路线，这条路线比较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武则天后，新上台的庶族中的地主官僚逐渐抛弃了前期的法家路线，变革新为保守，唐王朝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大地主阶级肆意兼并农民的土地，残酷的掠夺农民的劳动果实。八世纪中叶起，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在中央宦官掌握了兵权，把持朝政，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唐王朝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唐末黄巢和王仙芝等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腐朽的唐王朝。

隋唐考古资料，如实地反映了这些历史现实。

综合以前的研究成果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初步考虑了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学习和研究隋唐考古作参考。

1、农民战争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推行扫清了道路。斯大林指出：“**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隋末农民起义风暴，横扫了士族豪强地主集团，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局面。地主阶级的革新派由于阶级斗争实践的影响，使他们能从庶族地主阶级利益出发推行一条以打击士族豪强地主集团为中心内容的法家路线，这就是唐初中央集权之所以巩固，社会经济之所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2、唐朝前期，特别是武则天时期，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措施，注意革新政治上的腐败局面，从而使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大发展。这些无

论从建筑遗迹、墓葬材料、丰富的工艺品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遗物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

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隋唐考古也具体反映了这一特点。东北的渤海；北面和西北的突厥、回鹘；西南的吐蕃、南诏。这些民族都是在自己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向前迈进；但他们的文明都和当时先进的汉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而且直接受到影响。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给一切颠倒黑白、伪造历史、挑拨离间，为侵略扩张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人，有力地驳斥。

4、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悠久。唐代不仅把许多瓷器、丝织品、铜镜、建筑等文化艺术与亚非各国交流，而且又吸收了各国的文明。

二 隋大兴城的创建与布局

公元557年北周灭北齐，公元581年隋灭北周，隋文帝开皇二年六月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设计新都城。隋文帝最初曾封大兴公，这座新都城也就叫大兴城。

大兴城规模浩大，规划整齐，面积达83余平方公里。大兴城分外郭城、宫城和皇城。宫城先筑，皇城次之，最后修外郭城。城墙都是坚实的夯土墙，外郭城内由若干条东西、南北向的街道划为若干坊。这些坊又东西分属大兴、长安两县。郭城东、西、南三面为两县的郊区。城内遍布官府、王宅、寺院、道观，东西各置一市，还开凿三条水渠，宫城、皇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再北为大兴苑。

外郭城东、西、南三壁各开三门，其中南壁正中的郭城正门明德门为最大，有五个门洞；其余各门为三个门洞。郭城外距墙基三米许，有宽九米、深四米的城壕，郭城的墙基很窄，一般均在9—12米左右，并有不少地方残存宽度仅3—5米，与宫城墙18米相比，显然作为防御的重点不是郭城，而是宫城。同时，郭城又没有马面、角楼之类的防御设施，文献记载当时没有建门楼，这就更说明郭城的兴建不是为了防御。这也只有在北方统一之后，南方将要统一时才能出现的情况。

郭城内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其中通南三门和东西六门的6条大街，是大兴城的主干大街，其中除通延平门和延兴门的東西大街宽为55米外，其余都在100米以上，特别是朱雀大街宽达150—155米。这些宽广的街道，是大兴城规模的局部反映，说明了只有在隋大统一后，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才可能建造如此规模浩大的大兴城。

除宫城、皇城和西市外，这些纵横交错的大街把郭城分成108坊。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属大兴县，西属长安县。城内诸坊除朱雀大街西侧的四列坊，因北向皇城，每坊仅开一条东西街道外，其余各坊都设十字街，街端开门。坊四周筑夯土墙。城内各坊基本是居民区，其全部面积占全城八分之七，这比汉代都城有明显扩大。大约是承袭曹魏以来的都城为了直接控制大量人口的需要而规划的。但是全国统一之后，这种作法就意义不大了。所以从隋一直到盛唐，郭城南部四列坊居民很少，绝大部分被开垦为农田。延平门和延兴门间的东西街之所以显得窄于其他五条通城门的大街，当然与此有关。这说明各代都城的规划与当时形势的需要是有直接关系的。

大兴城设两市。东市叫都会，西市叫利人，对称地置于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面积各占两个坊，周围建夯土围墙，开八门，内设井字街道和沿墙街道。井字街两侧设水沟，市署和平准署位于井字街当中。两市是大兴城内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地区。从其位于城内中部以北，接近宫城和衙署，可以推知两市的工商业主要是为贵族官僚集团服务的。据文献记载：两市内“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长安志》卷八），可见当时两市是很兴旺的，从东西市的规模，我们可以看到隋统一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繁荣的景象。

大兴城内，隋初还开掘了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三渠分别从城东、城南进城，流经郭城，北入宫苑，其用途大概主要为解决宫苑的环境用水。三渠的规模设计，位置安排也是以前都城所没有或不能比拟的。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大兴城郭城的规模浩大是空前的，那种规划整齐的河渠、街道、坊、两市的布局，明显地反映了隋王朝统一全国后的经济繁荣。同时也说明，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经济一定要出现一个发展的阶段，这是历史的规律。

大兴城的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前是皇城，后靠郭城之北是大兴苑。至今在西安城内还保存有遗迹，如宫城的西墙南端被今西安城西墙所压。宫城南壁正中的广阳门和北壁正中偏西的玄武门均已探得。广阳门有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这是其它城门所未见的设置。广阳门前是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是大兴城最宽的街道。宫城中部为宫殿区，皇帝正殿大兴殿位于此区的南部。宫殿区东为太子宫——东宫，西为宫人居住的掖庭宫。

自东汉末期以来，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各代王室贵族为了巩固统治和确保自身的安全，便集中宫殿，加强宫殿区——宫城的防御，大兴城无论是从宫城本身的建筑，还是从宫城内外的布局，都表明隋统治者不仅承袭了上述作法，而且比前代大大加强了。

皇城位置紧靠在宫城的南侧，中隔横街，北无墙，东西两墙与宫城东西墙相接。南城墙为今西安城南墙所压。文献记载，皇城南壁有三个城门，东、西两壁各有两个城门，其位置均已勘探确定。其中南壁正中的皇城北门朱雀门，北和宫城正门广阳门相对，南往朱雀大街与外郭城南壁明德门相通。文献记载，皇城内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向街道五条，其间立中央衙署及其附属机构。

自曹魏邺城开始，诸代王朝都城内的中央衙署便开始集中，比如魏晋洛阳城，其中央衙署即集中在宫城南面大街的两侧。但在衙署外围另筑一城，即皇城，则是隋以前所未有的。这反映隋朝统治者为加强宫城的防卫，把宫城和其它大小统治者的宅第严格区分开来，使宫城与居民隔得更远，说明封建社会进入到这个时期，阶级矛盾更为激烈了。

宫城之北为大兴苑。大兴苑东靠浐，北枕渭，西包汉长安城，为皇帝游猎禁区。当然也起着宫城北边的防卫作用。

大兴城郭城内，绝大部分还是居民区，隋王朝为了对城内居民加强控制，除每坊置里司极力强化里坊制度之外，又在城内四周和主要街道两侧的各坊遍布王宅、官府和寺观。例如大兴城地势东南高、西北低，相差30余米，其间陡起约4—6米的高坡共六岗，除第二岗设宫殿、第三岗立百司外，其余皆被官府、王宅和寺观所占。另外，在郭城东南角筑起了离宫，并把东北角划归禁苑……。这些都表现了隋王朝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和监督，企图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罪恶行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大兴城的创建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见证。大兴城反映了隋王朝的大统一以及统一后在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繁荣。同时从宫城、皇城的布局及防范措施：各坊设门、墙，置里司；主街两侧、城内四角、和岗坡之地遍布官府、王宅、寺观等，这种对人民进行严密控制和监视，反映了隋王朝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反动本质。

表一

大兴城城、宫、苑、坊的尺寸（单位：米）

名称	南北长	东西长	周长	城(坊)墙宽	备注
外郭城	8651.7	9721	35500	9—12	有不少地方残墙存宽度3—5米
皇城	1843.6	2820			
宫城	1492.1	同上		18	东城墙部分是14米多
宫殿区	同上	1967.8			
太子宫	同上	159			
掖庭宫	同上	702.5			
大兴苑	11500	13500			
朱雀大街旁四列坊	500—590	558—700		2.5—3	
上四列坊之外到顺城街六列坊	同上	1020—1125		同上	
皇城两侧六列坊	660—838	同上		同上	

表二 大兴城街、渠宽度（单位：米）

名称	宽
一般通城门街	100以上
朱雀大街	150—155
延平—延兴门东西街	55
不通城门街	35—65
顺城街	20—25
坊街	15
皇城与宫城间横街	220
龙首渠	6
街道两旁小沟	2.5

表三 大兴城部分遗迹的尺寸(单位:米)

名称	长(进深)	宽	高(深)
龙首渠涵洞	5.5	1	0.75
广阳门	19	41.7	
城壕		9	4

三 隋 代 墓 葬

隋代墓葬目前发现的不太多，特别是大型墓几乎没有，主要的是小型墓，也有中型墓，都是单室。这些墓多集中在西安、洛阳、安阳、武昌、长沙等地。从目前发掘的资料来看，墓型及随葬品基本上承袭了南北朝时期的作风，但也有其自身特点。突出表现在南北各地的共同点逐渐增多，反映了隋大统一这个政治特点。在大业年间以后，隋炀帝统治集团奢侈豪华，激化了阶级矛盾，隋朝的政治形势急剧下降，最后葬身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汪洋之中，这种政治变化也在墓葬中明显表现出来。

小 型 墓 葬

隋代墓葬的突出现象，是南北各地发现较多的小型墓。这种小型墓葬在结构上都比南北朝时期复杂，面积增大，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也显著增多（图一）。其具体情况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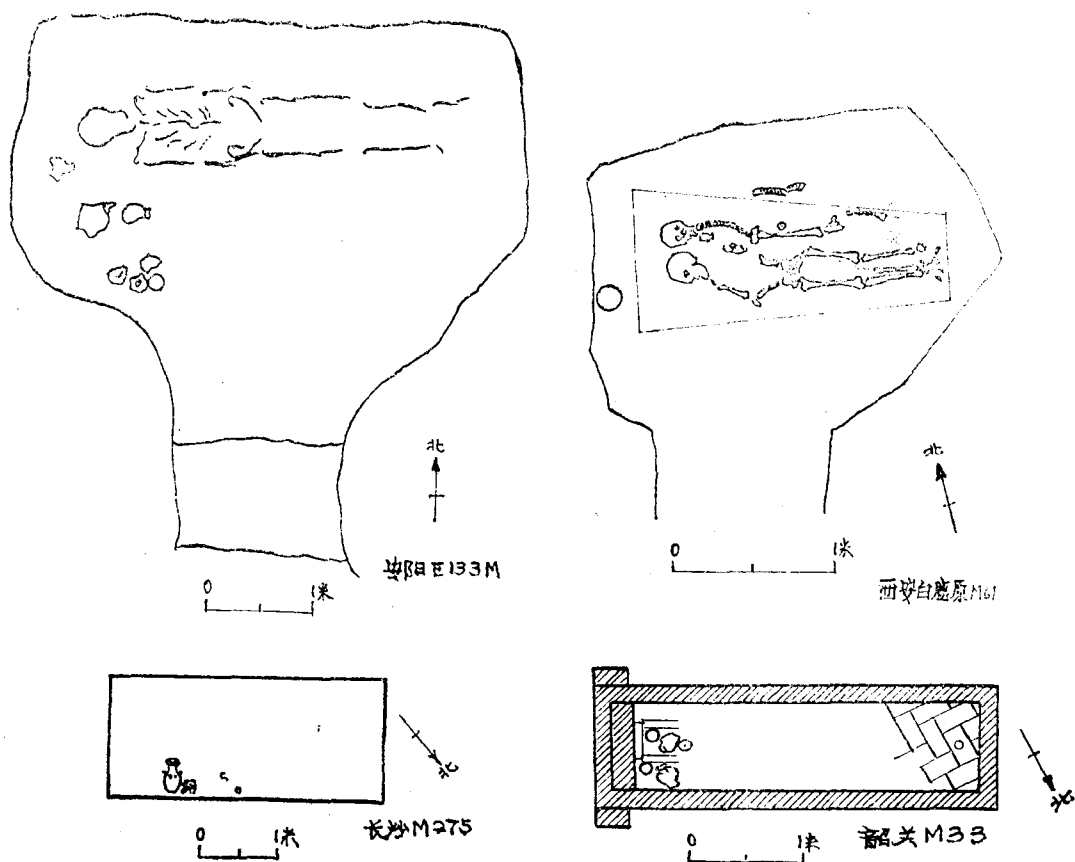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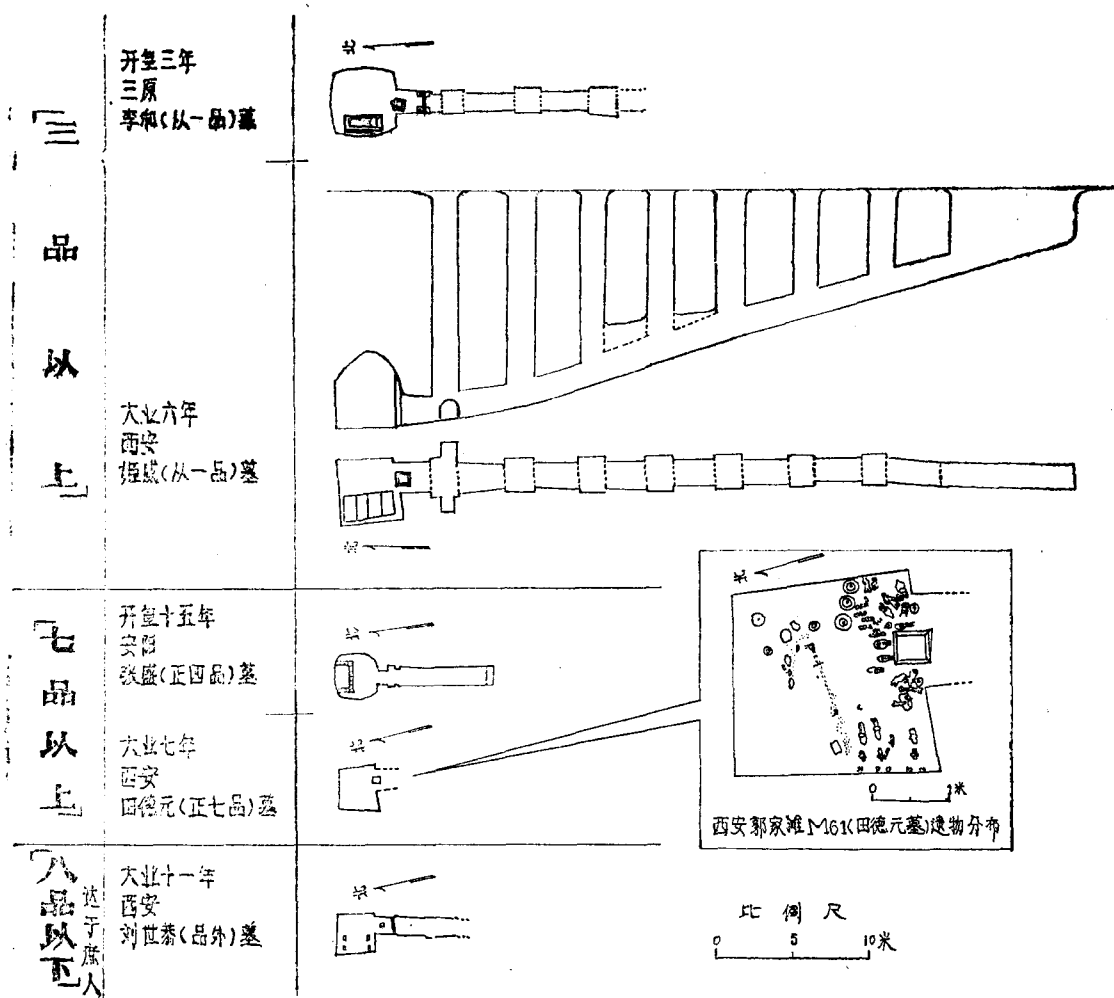
图 一 隋 小 型 墓

名 称 例	斜 坡 墓 道 长 (米)	土 洞 长 (米)	陶器			瓷器				铜器			永 通 万 国	隋 五 铢	铁器			银 指 环	漆 盒	蚌 壳	备 注	
			罐	壶	碗	罐	壶	瓶	碗	盂· 盖	镜	钗			簪	镰	铍					小 刀
河南洛阳 M88	2.48	1.92	2	1	1							1		1		1						《学报》59/2
山西太原 义井M12	√	2.65	1		1	1									2				1			《考古》63/5
河南安阳 E133坑 T形墓		1.75	3					4	1							1						《安阳发掘 报告》第4期
陕西西安 白鹿原M61	√	2.64	2											3			√			1		《学报》56/3
江苏扬州凤 凰河M8	竖穴土坑 3.10					1	1	1		1		√		√			√	1				《通讯》58/2
湖南长沙 56长红M6	竖穴土坑 2.65					2		1				1										《学报》56/3
广东英德 M13	砖室长 3.02		1		1			4	2	1		1										《考古》63/9
广东韶关 M33	砖室长 3.04				2			4														《考古》65/5

从这种小墓的形制、随葬品来看，应该是一般庶族地主的墓葬。这种小墓的增多，反映了隋统一以后，打击了一部分士族地主，使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及经济上的势力，相应地使各地的一般地主经济得到发展。这种变化，关东地区（旧北齐统治区）比关中地区（旧北周统治区）表现明显得多，而南方（旧南朝统治区）则比关东似乎又要显著。这正反映了从北周武帝开始到隋文帝的统一过程中，关东世族地主遭到了严重打击，江南的世族地主更是遭至了严厉的打击。隋初对南方和关东士族的抑制，是进一步稳定统一的需要，是当时生产较快得到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原地区隋墓的等级

中原地区除了上述大量小墓外，还有一批官吏的墓，大体可分三个等级。三个等级的划分和文献所记：“隋文帝初定礼：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达于庶人”（《通典》卷八六）接近（图二）。墓例如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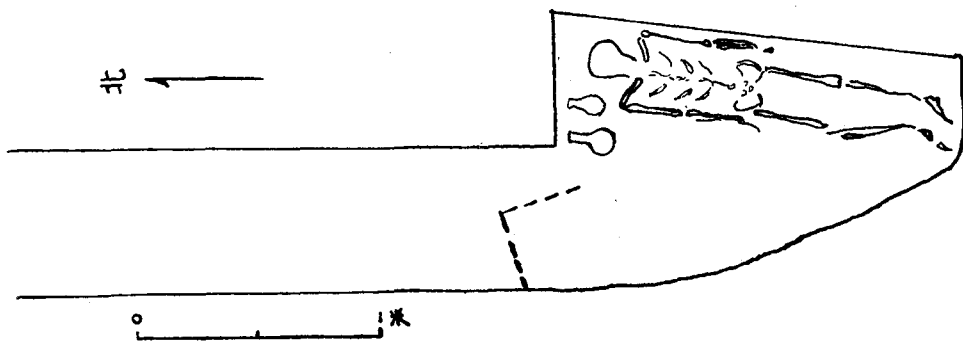
图二 隋中原地区墓葬的等级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墓室大小、设置和俑的种类、数量都有较清楚的区别。其中第三等级墓葬与前述小墓规模形制基本差不多，但俑是这批墓所独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官僚士族与一般地主间存在着严重差异。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反映了隋王朝封建中央集权的强化，这种强化对于经过三百多年分裂后出现的隋朝大统一的巩固是必要的。它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第二、从关中至关东，自开皇晚期起，特别是大业年间，三个等级墓随葬的俑和瓷器的数量都大量增加，姬威、张盛、田德元三例最为显著。姬威墓随葬的俑多达120件以上，张盛墓的瓷器多达80件，田德元不过是一个下郡的掾属小吏，竟随葬了34件仪仗俑，其中还有13件骑马的仪仗俑。仪仗俑的内容也逐渐在变化：延自北朝的甲骑、女骑开始消失；出现一般的女仪仗；过去被盗掘的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席德将墓和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严元贵墓都出现了执鸚的骑俑；女侍俑也较普遍的增多，这些都反映了隋晚期中上层统治集团越来越追求享受，讲究排场（图三）。特别是代表大世族利益的隋炀帝统治集团，执行一条儒家的反动路线，过着极其奢侈腐化的生活。他们无止境的挥霍享受，完全建

品级	墓例	天井数	小龕	单室土洞		石门	石床	石棺	石槨	俑数	模型明器	陶器	家禽家畜	备注
				形状	长度(米)									
从一 一正三	※开皇二年陕西源上柱国徐州刺史德广郡公李和	5		弧方形	约4.0	正中	✓			80		2	19	《文物》66/1
	大业四年陕西西安李静训			弧方形		正中			✓	约70	13	约20		《考古》59/9
从一 一从四	※大业六年陕西西安使持节金紫光禄大夫龙泉燉煌二郡太守汾原县公姬威	7	2	斜方形	4.1	偏东	✓	✓		120以上	7	9	15	《文物》59/8
正四	开皇九年河南安阳骠骑将军遂州刺史宋循			弧方形	3.3	正中				20		5	4	《考古》73/4
正五 一正七	开皇十二年陕西西安大都督左亲卫车骑将军吕武			斜方形	约3.0	偏西				59		16		西安郊区隋唐墓
从三 一正四	开皇十五年河南安阳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张盛		2	弧方形	约3.0	正中				93	27	65	9	《考古》59/9
正七	大业七年陕西西安豫章郡西曹掾田德元	✓		斜方形	约2.6	偏东				40	1	6	2	《文参》57/8
	仁寿三年河南安阳处士卜仁			斜方形	约2.0	偏东				10	10	5	✓	《文参》58/8
	大业十一年西安左备身府骁果刘仁恭			斜方形	约2.6	偏东				4		17		《学报》56/3
	河南安阳小屯M18			刀形	约2.5	东侧				20	✓	✓	✓	

附“※”者，该墓早年被盗。

立在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这样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风暴很快就推翻了这个短暂的隋王朝。第三、墓室平面早期还保存了北朝墓所具有的四壁向外凸出的弧线，即所谓弧方形。关东地区的弧方形还接近园形，大业年间流行前后壁、左右壁各不平行、左或右壁靠墓门一端外斜成斜方形。这种斜方形墓的墓门，也改变了过去门在前壁正中的作法，而开设在前壁的左或右侧。棺槨的位置也相应地从墓室正中移向墓室两侧。不过早期的制度并不是取消，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文帝长女周宣帝皇后的外孙女李静训墓仍保持旧制来看，早期墓制反而用于更高的等级了。另外，较小的墓葬出了一种类乎前述小墓中的那种刀形平面（图四）。这种墓似乎都是单人葬，从有的随葬二十件左右的俑的数字，可以估计墓主人的身份是属于“八品以下达于庶人”这一等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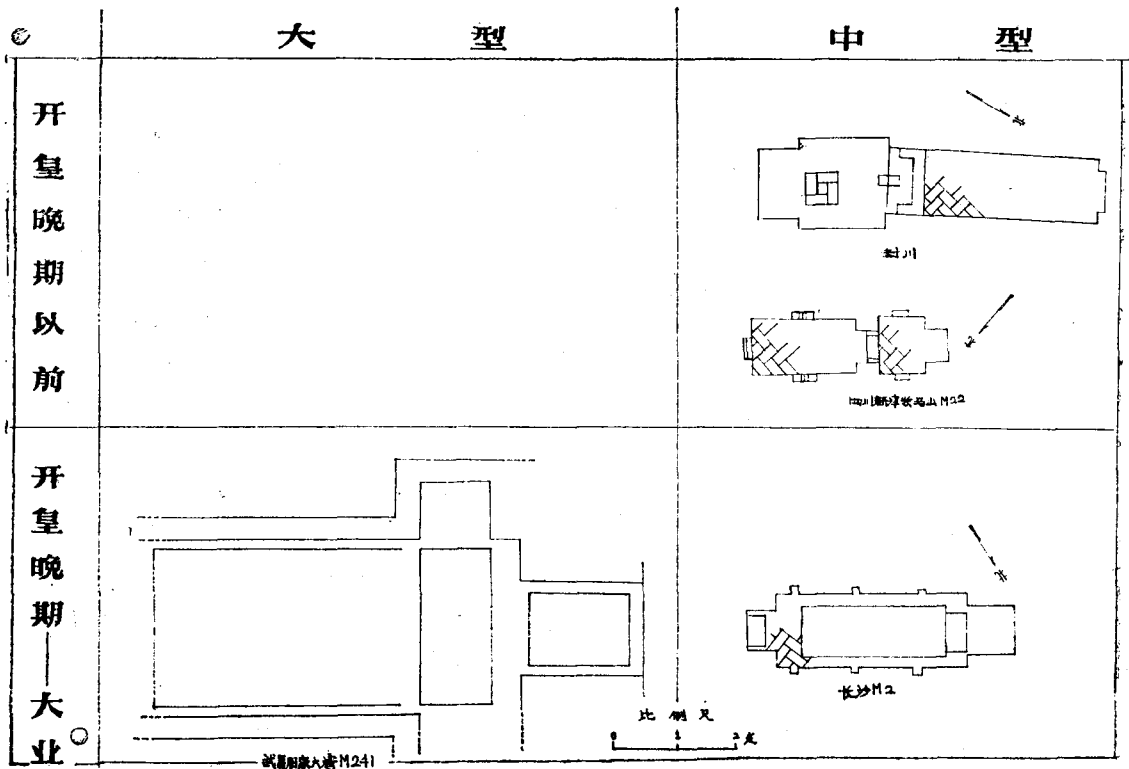
图四 安阳刀形墓

南方墓葬

南方隋墓还保存着长方形券顶砖室墓的地方特点。随葬器物主要也还沿袭南方系统。不过广大南方地区，各地墓葬表现的共同特征逐渐增多。同时，南北朝时期南北两方各自地方特征差异较大的情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南北之间的共同特征也逐渐增多，例如唾盂的形制在这个时候南北基本一样，碗的形制几乎无异，过去属于南朝特征的桥形系鸡首壶，此时也在北方出现了。这些应是隋灭陈后，不断削弱了南方割据势力的反映，同时又说明隋统一之后，南北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的情况。

过去是南朝墓葬主要集中点的江浙地区，入隋后，墓葬却突然稀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南方墓葬发现较多的所在，似乎已转移到从武汉经长沙至广东的一线，这种情况说明了盘踞在江浙的传统士族已急剧衰落，而自汉水流域南下广州的这条新的交通干线日益繁荣。

南方墓葬的等级区分没有中原那样清晰，但发展趋势和中原相同，即从开皇晚期起，特别是大业年间，墓室在扩大（图五）。随葬器物在增多，各种随葬品的质量也日趋精细，如下表：



图五 隋南方墓葬

分期	名称 例墓	墓室		随葬品 总数	陶器	釉瓷	俑	铜器	备注
		形制	长度 (米)						
开皇以前	※开皇元年四川新津M20	前后室、两室左右壁各有小龕二	4.27	7	✓	✓			《考古》1958年8期
	湖南长沙黄岭墓	凸形墓、左右壁各有小龕三	5.00	20		✓		✓	《通讯》1957年4期
开皇大晚期	湖南长沙赤峰山M3	长方形	3.30	66		✓	✓		《文物》1960年2期
	广东封川墓	前后两室	5.80	9		✓			
	湖北武昌周家大湾M241	前后两室、两室左右壁各有小龕二	9.28	85		✓	✓	✓	《通讯》1957年6期

较晚出现的俑,以男女侍俑为主,武昌周家大湾241号墓残存的男女侍俑大小高低差别显著,现以女侍俑为例,如下表:

高度 (厘米)	髻式	服饰	姿态	残存件数
53.5	双髻髻	宽袖袍,高头履	直立,双手或单手持物	2
40	高髻	窄袖衫,长裙,高头履	直立,拱手捧物立于台座上	1
40	盘双髻	宽袖衫,长裙,高头履	直立,单手持物,	1
30.2	盘双髻	窄袖衫,长裙,尖头履	弯身,作趋奉状	1
21—33	盘髻	窄袖衫,长裙,尖头履	作趋奉状,或作操作姿态	3

高低不同的女侍俑、髻式、服装和动作也不同,这正是侍俑身份不同的写照。作趋奉式操作姿态的小型侍俑,其地位显然与上面三类直立捧持器物的大型侍俑有别。随葬侍俑出现清晰的等级区分,说明当时这类俑受到了重视。武昌周家大湾241号墓除侍俑外,还有较高官阶的人才能随葬的高65厘米的著笼冠长袍的侍吏俑和十二时俑,这些和前后两室长近十米的大墓室,都可表明墓主人身份的特殊。这样高官职人物的墓葬竟然以男女侍俑为俑的主体,中原地区常见的仪仗俑都没有发现。很清楚,这只能意味着隋晚期生活在南方的中上层统治集团骄奢腐化急剧发展,隋末农民大起义很快的从中原扩大到江南、岭南,就是这批人残酷压榨南方人民的必然结果。

四 隋代陶瓷工艺

中原地区陶瓷工艺和瓷窑遗址

在隋代全国统一的基础上，民间手工业迅速发展，突出的要算陶瓷工艺，而中原地区的安阳，又是隋瓷发现最多的地区（图六）。

安阳地区的中小型隋墓，有随葬四个四系青瓷罐和一个高足盘，上扣几个青瓷碗组成的子母盂盘的习俗。大约从开皇晚期起，这个地区的陶瓷出现了新工艺，烧造出黄瓷；北齐末年出现的白瓷，在这个阶段更加成熟；为了不露胎的颜色，有些在胎釉之间使用了白色的护胎釉。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张盛墓的发现，使人们对于隋代瓷器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提高。该墓共出了80件瓷器，其中除三件绿釉瓷碗外，大部分是带有浓度不同的浅青色白瓷。二件高72厘米的侍吏俑和一件高50厘米的镇墓兽，都接近了标准的白瓷。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件明器的发、眉、须和服饰躯体的有关部位，成功地烧造出了黑彩。黑彩白瓷早到这个时期，是出人意料的。另外，这批瓷器无论是仿金属的各种壶、炉，还是仿漆器的几案、棋局，以致人物、动物的造型和雕塑，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新近在安阳北关洹水河畔发现了面积广阔的青瓷窑址，出有隋墓中常见的青瓷碗、四系罐，还有大量的青瓷片和浅青乃至白色的瓷片。窑具大多是三叉形窑具，窑室平面呈马蹄形。在附近还发现了贮存没有蘸釉的瓷碗胎的土窖。证明这是安阳隋墓所出瓷器的原产地。

河北磁县贾壁村寺沟口西沟北山坡上的窑址中，所发现的瓷类和釉色以及窑具，都与安阳相近，应属同一系统。山东曲阜隋墓出土的青瓷双系瓶和西汉鲁灵光殿遗址上层发现的青瓷片的胎、釉的特点也和安阳相近。曲阜红土埵窑址也发现了安阳隋墓中常见的高足盘、青瓷碗。这些都很清楚地说明了继承北朝传统的安阳制瓷业，在当时关东一带是很有影响的。

西安地区的隋墓从大业年间（公元605—616年）开始随葬较多的瓷器。从瓷器的形制和数量日益增多的趋势分析，这里所出的较高级瓷器有可能是来自关东。如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所出连珠兽头纹扁壶、螭把双身瓶就同张盛墓所出风格相似。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姬威墓所出的三件内外满釉的带盖罐，色白淡黄，与一般认为邢窑的产品相同。大业末年，西安较小型墓中出有细泥红胎的黄釉器，目前，这种器物的烧造地点尚不清楚，但这种器物的造型，如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刘仁恭墓所出的四系罐、高足盘都和关东地区极其相似。

洛阳河西地区出有隋五铢的墓葬中，随葬烧成温度较高的大型双耳罐、壶、小型卷唇罐、米黄色釉陶碗等日常生活陶器。这与同地区魏晋北朝随葬的灰绿或橙黄色，胎质较松的陶器不同。洛阳发现的大业末年隋墓中，随葬有较精致的以白瓷为主的灯、瓶之类的一般用品。这些灯、瓶的胎、釉质量很高。据文献记载，大业初期，隋统治者曾下令将河南诸郡的“艺户”三千家迁至洛阳。这些较高级瓷器的出现，大约与他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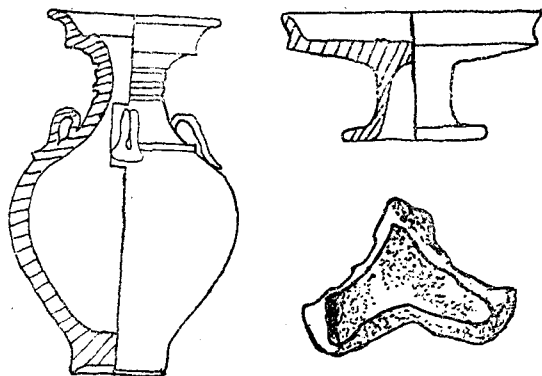
洛阳东邻巩县城南白冶河两岸分布有不少唐代白瓷窑址。虽然这些瓷窑之中还没有可以肯定为隋代的，但在小黄冶、铁匠炉村，都发现相当数量的隋青瓷碗、高足盘残片。残片的釉色、造型与安阳所出相似，可以推测，此处新兴制瓷场与安阳瓷窑有一定关系。

上述发现的几处隋瓷地点，说明了隋代的陶瓷工艺的重点仍在旧北齐都城——邺城附近，即安阳一带。尽管隋代的统一是短暂的，但从这些窑址的分布与发展，特别是白瓷的烧造也可反映出中原地区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南方陶瓷工艺和瓷窑遗址

南方青瓷传统烧造地点的浙江，可能由于政治原因，出土瓷器很少。但在南方广大地区，陶瓷工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提高。

淮河流域，在治淮工程和淮南一带的隋代墓葬中，发现了不少胎色青灰的罐、瓶、盘等青瓷器及其残片。这时青瓷的器表上往往饰以多种纹饰：刻划的花瓣、戳印的莲花、先用模制，后贴到器物上的具有锤鏤效果的忍冬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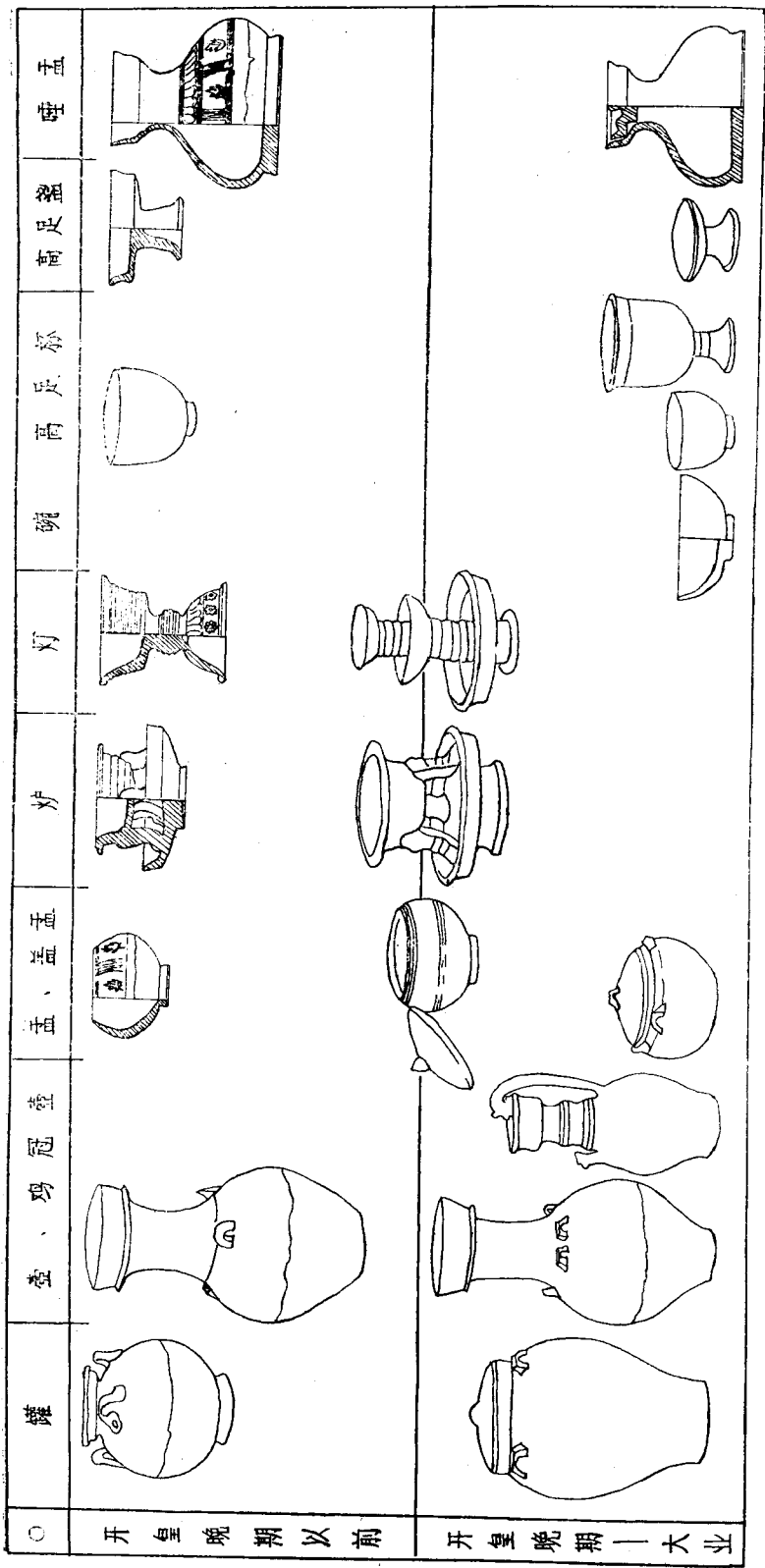


图七 淮南市管家嘴隋窑址出土的
瓷器和窑具

淮南市东部高塘湖畔管家嘴地区的发现，证实了这些瓷器均为本地烧造。这里所发现的盘口四系瓶、高足盘，及三叉形窑具等，都与安阳地区相类似（图七），而瓷器上所流行的花纹装饰却为长江中游隋瓷中所常见。此地原属寿县，唐代的窑址分布也很多，很有可能这就是寿州窑的前身。隋统一前，淮南长期沦为战场，统一后，这个地方处于南北交通要道，经济发展较迅速，出现新的制瓷工艺，而同时又使它兼备了南北二地的风格。

长江中游的长沙、武昌隋墓发现的青瓷器说明了长江中游陶瓷工艺的逐步提高，长沙开皇晚期墓出土的器物，烧成温度较低，但在器类和装饰上，都比此地区南朝制品复杂，出现了象四系罐、高足盘、高足灯、敛口盂等新器类。印花、刻花也比以前的盘、碗扩大到罐、壶、灯、粉盒。开皇晚期以后墓所出的器物烧造温度有了提高，出现了胎质较为坚实，均薄光亮的青绿或黄绿釉器。器物的一般特征是向高发展，罐、壶等器物腹部以下内凹的曲线也日益明显。许多器物增加了盖和便于提放的系耳。武昌、长沙地区的陶瓷工艺的发展，可以看出与江苏关系密切，但质量上不如江苏。如武昌241号墓所出鸡首壶就不如连云港所出的同类器。长沙赤峰山4号墓出的灯台、插台和附有釜、勺的小灶，具有江西、福建的特征。这也说明长江中游与它们东南邻区发生了较多的联系（图八）。

四川新津地区隋初墓中出土的青瓷碗，敛口、平底、胎色灰白，浅青釉。有的碗内留有支具痕迹。新津城西山坡和邛郫固驿镇瓦窑山两处遗址中，发现了类似上述墓中出土的青瓷碗、四系罐、高足盘等残片。这两个地点临近成都，应是隋时益州蜀郡的重要制瓷地点。所



图八 湖南长沙、湖北武昌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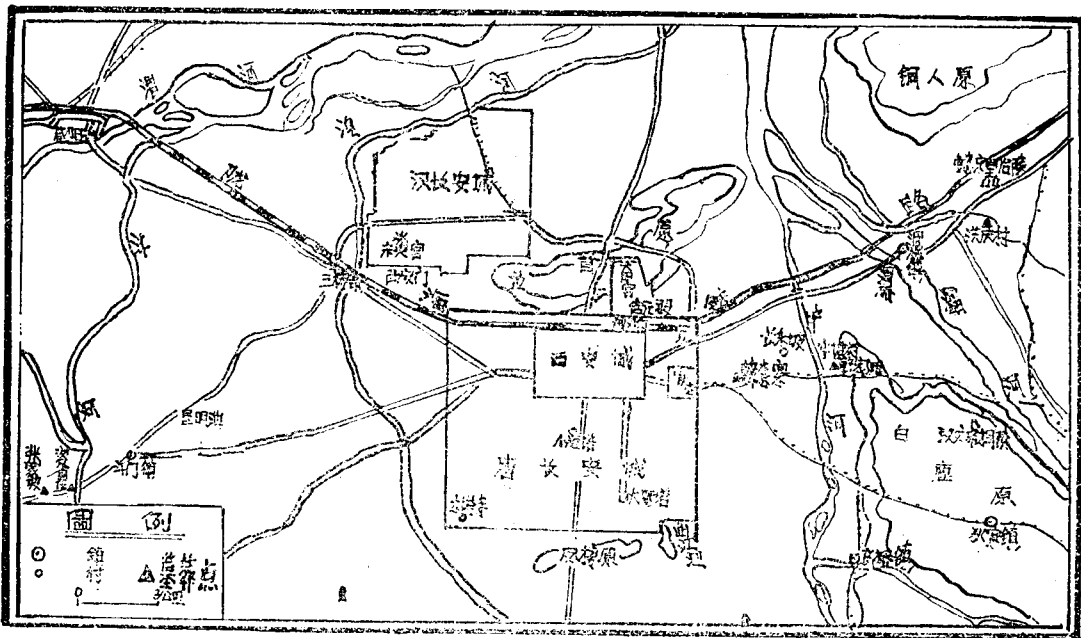
发现的器物 and 窑具，说明了四川地区陶瓷工艺沿袭南朝，与长江中游关系密切。

广东地区的隋墓无论是数量还是分布的地点，都超过南朝。这里所出的青绿釉十足砚、高足杯及罐的演变趋势，多和长沙相近。如罐腹逐渐内凹及系耳增多等，同时地方色彩也在增多，如带盖罐的普遍出现，韶关、封川所出青绿釉器上捺印的多瓣形花纹等。在泔洗隋墓所出的青绿釉碗内胎上，有园饼形陶垫，这种园饼形陶垫是较原始的窑具，它和广东各地的青绿釉器烧成温度一般较低，器类较贫乏，这些都说明广东地区的陶瓷工艺还落后于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

南北各地所发现的陶瓷器及窑址说明了在隋代统一全国以后，经济迅速发展，陶瓷工艺的发展要比南北朝普遍。南北方广大的制瓷工匠不但继承了过去传统，而又创造出许多新工艺。统一后的全国，排除了南北分隔，也便利了南方各地区间的交通往还，从而更大规模地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经济的发展，各地所发现的陶瓷和有关资料，多少表明了这个统一时期的历史概况。

五 唐代墓葬

唐代自建国至灭亡，经历了二百九十年（公元618—907年）。西安是隋唐两代都城所在地，从公元六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世纪初，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在西安及其邻郊，不仅有规模很大的隋唐遗址，而且有数量极多的墓葬（图九）。从已发掘的资料看，唐玄宗开元末似可作为唐前后期的分界线，安史之乱更扩大了前后的区别，九世纪中叶以后，西安地区的唐墓已成了尾声，这正反映唐末农民大起义已迫在眉睫了。以下我们以西安地区唐墓资料为重点，结合其它地区材料，作一大致分期。



图九 西安郊区隋唐墓地理位置图

前期：武德三年——开元末年（公元620—741年），约一百二十五年。

后期：天宝元年——天祐四年（公元742—907年），约一百六十五年。

墓葬形制

墓葬形制大致有土洞、刀形砖室、方形砖室（以上均为单室墓），双室双砖室四种（图十）。

①土洞墓：一般长方形，券顶，棺床顺置，墓道有竖井式，也有斜坡式和阶梯式。

②刀形砖室墓：券顶，棺床顺置，斜坡墓道，大部有甬道部分，有甬道的上开天井，天井两侧有小龛。